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牛棚”之外的“牛鬼蛇神”	郝 斌
【研究报告】	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下）	郭 建
【亲历者言】	毛泽东说：武装上海十万工人 ——砸上柴“联司”的前后经过	徐景贤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牛棚”之外的“牛鬼蛇神”

· 郝 斌 ·

1968年春天，聂元梓主持的“红色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合编各系、各单位的“劳改队”，建立全校性的“牛棚”，“牛鬼蛇神”集中食宿，每日批斗、劳动。我当年是北大历史系助教，从沦落之日起至“牛棚”解散，没有一天缺席。

如今屈指一算，历史系“牛棚”先后关押过的30多人，向达、杨人梗、邓广铭、邵循正、罗荣渠、商鸿逵、范达仁、夏应元都在“牛鬼蛇神”之列。

但免除了随时批斗和劳动的“牛鬼蛇神”也有几个，不过，他们的境况似乎比我们的更糟。

第一位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翦伯赞一因毛泽东钦点干系重大，二又常年哮喘，身体太差，他的一把骨头一拉就会散架；要是真拉散了，把该交代的材料一起带走，这个责任谁担当得了？因此他被关在房里写交代的时间居多。不过，盛大的批斗会从来没有让缺席。有一回他被单独拉出来，被命站在马车上，不疾不徐，在校园的大道上转了一遭。他被喝令站在车上，手没得扶，腰没得靠，路边的学生只觉得别致有趣，活像是一场猴戏——这一来，可苦了翦老，他在车上只求一不栽倒，二不颠散。这就是他没进“牛棚”单独散养的大概情况。这种日子过了将近三年。

1968年12月18日，中央直属“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位副组长。姓巫名中，来到翦伯赞住的燕南园64号，对他多次逼讯。翦老一生治史可谓世事洞明，大风大浪的三年都熬过来，这回怎么走不过来了？无论当时，无论事后人们都认为“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可当时就是没弄清楚，今天就只能仍是一笔糊涂账了。他与老伴戴淑婉，袍服鞋帽，穿戴整齐，服下足够的安眠药，虽不能以寿终，也算是双双保全了骸骨。骸骨虽全，送到火葬场，却被用了化名。后来平反、开追悼会的时候，连骨灰也无从寻找了。

此外，没进“牛棚”的还有哈佛的博士、学贯中西的齐思和教授以及副系主任许师谦。他们二人，一个糖尿病，一个脑血栓，“文革”发生的前一年，1965年，已经卧病在床，站都站不起来了。要斗他们，还得有人左搀右扶，那不成个斗相。那样批斗他们，不仅长不了革命志气，反要惹一身晦气。因此，就让他们单独享受床前批判和口头交代的待遇，监督劳动也就不提了。

许师谦，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在昆明加入地下共产党。1957年来到北大，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多年独身生活，40多岁了，方才成家。“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是系副主任，早病倒了。他的夫人，在中学任教，也受到学生冲击。夫人早上出门，在许师谦的床头留下几个火烧，一瓶白开水，瘫痪的许师谦，只盼审问、外调的学生到来。有时候他一天吃不上饭，火烧和水就在床头，可他身子半瘫，就是伸不动手，拿不到水。审问者到来，不递给他水和火烧，就无从开审。审问、外调，当时是我们“黑帮”害怕又难躲的事，一语不合，就遭一顿打骂，他却盼审、盼调。许师谦后来同我们谈起此事，让我这个同类也感唏嘘。

第四位没进“牛棚”的是汪篪教授，时任代理副系主任。他专攻隋唐史，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史学系，1939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当陈寅恪的研究生，受过严格的史学方法训练，采用材料严谨准确，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陈寅恪写《元白诗笺证稿》，让年轻的汪篪作助手，汪篪也由此大致形成自己的治史路数。在我们眼里，他随和亲切，思想又很深刻。

“文革”发生前，不知什么人要为唐朝名相魏征写传，要汪篪帮了点忙。只因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有点海瑞的影子，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挨批，就像病毒传播一样，《魏征传》也有了歌颂海瑞第二之嫌。不过，起初的一段时间，批判归批判，总还保留着“学术批判”的最后一点界限。没想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发的通知中，竟点名说吴晗《海瑞罢官》原本是政治问题，却把他作为学术问题去讨论，那是彭真的阴谋和霸道。这样，早与《海瑞罢官》绑在一起的《魏征传》也就无处藏身了，汪篪也因此被牵连其中。学生把斗争会开到他家，大字报贴到门上，他受不了，他要抗争！那个时候的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死！汪篪之死，时在1966年6月11日。他走的时候，北大的“牛棚”还没有来得及建立。

第五位免除示众批斗的是俞伟超，考古专业的年轻讲师，当年不过33岁。“文革”结束以后，他主持过山东临淄齐汶城遗址等多项考古发掘和调查；上世纪90年代，他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长江三峡水库动工之前，成立了一个文物勘察和保护小组，主其事者就是俞伟超。秦汉考古是他的擅长。“文革”初他被揪出来的时候，在系里没担任什么负责的职务，因此只戴了一顶“黑帮小爪牙”的帽子。

批斗过几次之后，他用双手去触摸电门，因此失去了两根食指。“千古艰难唯一死”，俞伟超一死不成，复求再死，一个苦雨凄风的下午，他去北大附近的铁道上卧轨。司机远在200米外就鸣笛、刹车，无奈他决心已定，纹丝不动。火车惯性前行，幸亏车前装有木质挡板，把他推出好远，虽没伤及骨骼，臀下肌肉，已经被推得模糊一片。这是1966年7月间的事。批斗会如火如荼的时候，他正躺在医院里。接着揪出来的十几个人，个个罪名都比他大，相形之下，大家悟到这个“小爪牙”实在太小太小，实在算不上什么。这样，俞伟超慢慢被人冷落在“牛棚”之外。

不想，几年之后，俞伟超对学生张承志叙说他“文革”中自杀经历的时候，竟然吐露：“大家都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两次，不知道还有一次。我从来没告诉过别人：在阳台上，绳子断了。”

□ 原载《南方周末》2013年4月11日

~~~~~

# 【研究报告】

## 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下）

• 郭 建 •

（续 zk1705d）

秦晖描述的造反派被“剿灭”的情况具体是指1968年中央关于广西武斗的“七·三布告”发布前后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书记韦国清同广西省军区部队和相对保守的群众组织“联指”对造反派组织“四·二二”施行的血腥镇压，甚至导致多吃人事件，有八万多人死于非命。秦晖的结论依据大量的八十年代“处遗”档案资料，属实。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广西文革期间的情况比较特殊（韦国清也是同等位置干部中唯一的不倒翁），秦晖关于造反派被“剿灭”的结论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也不是造反派的亡灵。在文革期间受迫害最深，时间最长的群体并不是造反派，而是那些既不是造反派，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当权派，什么派都不是，而且什么派（包括造反派）都想躲开他们的政治贱民，即被视为阶级敌人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和家属，就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一样。在清队运动中，他们也是受迫害的最大群体，而且从1946年黑龙江元宝村土改开始，这个群体就一直是最软弱、最受欺凌、最被人不当作人、最没有话语权和代言人的群体。其实，在秦晖提到的广西惨案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中有一半以上是这个群体中的人，更不用说完全以这个群体为打击对象的“红八月”北京昌平惨案、大兴惨案和1967年夏季湖南“乱杀风”和道县惨案了。

谭合成的《血的神话》是关于道县惨案的专题报道和研究，其中有一个场面很形象地显示了当时各个“人群”的自我认同、社会角色和相互关系：在47军6950部队刚进入道县制止“乱杀风”时，一些“黑五类”政治贱民为躲避屠杀从“保守派”群众组织“红联”（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控制的道县农村逃进县城，向以道县二中为指挥部的“造反派”群众组织“革联”（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求救。这个事件的背景是：“红联”与“革联”两派都自称革命造反派，互相称对方为“红老保”和“革匪”，为夺权而武斗不止。“革联”抢了县武装部的武器弹药，占据县城；“红联”则占据周围的农村，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此时突然有谣传“黑五类”要造反，还有造反纲领，于是“红联”与地方武装部和基干民兵合作掀起杀人风，并成立了很多“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作为裁决机构。在道县有4519人被杀害（包括道县在内的零陵专区死亡人数高达9093），只有少数“黑五类分子”侥幸逃入县城。但造反派“革联”将这些可怜的人拒之门外，因为他们不愿被人指责“同情阶级敌人”。所以，“黑五类”在县城的处境依然困难：农村有“保守派”的围剿，城市有“造反派”闭门羹，自己只好在街上搭些简陋的棚子避风雨，可又没有吃的。好在军队还做了些好事：救济难民一点粮食或护送他们乘公共长途车逃出道县（军人随车，以保证愿意外逃的难民在沿路的关卡上不被屠杀或者劫持）。〔21〕军人是否真同情这些难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军人是在执行命令。6950部队听命于47军军部，47军是野战军，直接听命于北京，而北京的领导人恰恰又是把这个人打入另类的决策者，阶级斗争的始作俑者。哪有这些可怜人的出路呢？

## ◇ 同床异梦：造反派、新左派与西方“文革毛主义”理论家兼及其他外来理论资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造反的年代，在中国有造反派，在很多西方国家也有。当时在西方各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反体制、反文化运动，力争民权（种族平等）、女权、性自由、个性解放，以及同性恋者权利。国家机器、官僚体制和精英政治受到严重挑战，造反有理和大众民主的呼声此起彼伏。但西方国家的群众造反与中国的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造反是在民主制度下群众的自发行为，而中国的造反是在极权统治下奉旨听令的，被“运动”的；前者抨击的目标是自己社会的体制和文化，而后的既定目标是强化自己的极权体制，或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封闭状态，外界对中国了解甚少，也由于以1968年5月巴黎学潮为标志的西方文革比中国文革爆发晚了两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便在世界范围内成了造反的样板。在西方左翼阵营中的激进派看来，苏联因推行官僚政治、精英政治，已经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以发动群众清除政权内部资本主义因素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则标志着世界革命的新发展。对于世界各国的热血青年来说，文革造反精神正与自己内心积郁已久的叛逆感和理想主义共鸣，他们在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传闻中得到了灵感、启示和动力。当时许多国家都有学生造反，成立红卫兵之类的群众组织，占领校园，串联社会。各种外文版《毛主席语录》畅销一时，不少学生都以“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者自诩。

此时也正是西方后现代各路左翼文化批评理论的形成期，某些理论家的思想明显受到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影响，并成为毛式文革的拥护者和辩护士。例如，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在文革真相已经广为人知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仍以热情的笔调赞美文化大革命，说“新中国未完成的社会实验……在世界史上无与伦比”，在那里，“人作为集体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新的把握”，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客体世界”。〔22〕杰姆逊对毛泽东未将自己亲手发动的“群众运动”进行到底颇感惋惜。尽管如此，毛的文革理论仍旧是六十年代“最丰富、最具革命性的伟大思想体系”。〔23〕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中国的文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大革命不同，在中国文化没有变成商品，而是用作教育群众的手段，“为新社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以对抗政权本身的官僚主义，建立一个理想的社群，所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德里克还说，毛泽东作为革命家，其独到之处就在于他竭力阻止革命成功后难免出现的“非激进化”（deradicalization）倾向，以“政治挂帅”对抗经济主义（即苏式“现代化”理论），以文化领域中的不断革命推动社会主义的进程，防止在中国出现苏式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他把毛的晚期思想称作“文革毛主义”，并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24〕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出现的新左派，与这些西方左翼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从师于这些左翼理论家的中国学者（如崔之元、刘康、张旭东）认同老师的看法，另一方面，国内的学者（如汪晖）受中译理论著作的启发并感到了共鸣。总之，新左派是借西方理论家的“慧眼”重新发现自己经历过的文革的。在九十年代初，人们对文革灾难还记忆犹新，为文革涂脂抹粉的话还不好直说，所以刘康只得或借用些西方文化批评的语汇在理论上兜圈子，讲什么“文化霸权”和“重建”，或以历史比较为名，把葛兰姆奇、阿尔图塞、福柯等人的主张与文革理论并提，搞出一套“谱系学”，以英雄所见略同来抬高文革和毛泽东的身价。〔25〕张旭东将1949年以后包括文革在内的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相对照，称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是“激进的民主社会”。据他的观察，“改革派官僚一直在密切注视和防范任何重提或挪用毛泽东有关大众民主和参与观念的企图”，同时，“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文革和大众民主的继续不断的批判以及他们对专家政治的默许更加强了官方的各种反民主措施。”〔26〕他还认为，西方文化霸权和全球化使中国失去了自我

认同，而毛以文革来创造“社会主义新人”是重建自我认同的尝试，可惜目标过于高远，“高处不胜寒”，失败了。（27）崔之元吹捧文革最不着边际，称文革有诸多“合理因素”，并说“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28）有中国新左派领军人物之称的汪晖认为中国民间及官方否定文革是对六十年代理想主义的背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被他称作“去政治化的政治”，也就是不再有六十年代的目标、价值和意义的政治。（29）习近平提出不能以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听到这一主张以后，汪晖好像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看法，把六十年一锅煮，煮出一套中共“自我纠错机制”。（30）可是他“沉痛悼念”戚本禹的花圈却好像在说，他仍旧心系文革。

与西方文革派和中国新左派相比，造反派并没有什么理论，也没有全心全意地赞美文革。但在某些思路和对文革的一些具体判断上，造反派和新左派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例如，周伦佐就认为西方六、七十年代反体制、反官僚的造反学生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与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共鸣。“后现代主义与造反派看似有相同的解构冲动，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对象是艺术文本，造反派的解构对象是政治权力。”他还说：“曾在‘文革’中被毛泽东邀请到北京一同检阅造反大军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文革’中毛的非组织化异举和民众的反官僚行动，是存在主义的伟大实践。萨特目光所及，显然是毛与广大青年造反者共有的非制度化行为。”（31）萨特同毛一起检阅造反大军的消息是误传；让一保尔·萨特登上天安门检阅游行队伍的时间是1955年国庆节。但文革期间萨特的确瞩目中国，希望中国的造反成为巴黎学生的灵感。由于这个原因，他力排众议（包括《现代》杂志编辑部所有成员和他女友西蒙娜·波娃的意见），拒绝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刊登彭述之访谈录，因为这位旅居巴黎的中共元老在访谈中涉及文革真相。（32）

萨特是老左派，他的视角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莫斯科变色了，而北京仍然是红色的，可以成为世界共产革命的延安），而我前面提到的杰姆逊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的角度观察中国的，而且，他的观察中有很明显的造反派情结。我们不妨看一段杰姆逊对文革的评论：

在六十年代，人们一时都有一种同感，即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这是一个普遍解放的时刻，一个全球性能量释放的时刻。毛泽东对此进程的形象描述最富于启示性。他喊道：“我国就像一粒原子……一旦原子核发生裂变，释放出的热能必将产生惊天动地的力量。”这一形像向人们展示了在古老的封建村庄结构分崩离析后，在文化革命对这些结构所遗留的习惯作了快心的扫荡之后，一个真正的大众民主社会终于诞生的景观。然而，原子的裂变，分子能量的释放，或“物质能指”（material signifiers）的解放，本来就可以是骇人的奇观；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究竟还是在他自己发动的运动所产生的最终结果面前退缩了：在文化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在上海公社诞生之际，他阻止了党的机构的瓦解，有效地扭转了整个集体实验的方向（这一逆转所产生的后果在今天看来是再明显不过了）。在西方也是如此：六十年代伟大的剧变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恢复，使得各种国家机器压迫力量卷土重来。（33）

这段文字来自杰姆逊的《六十年代阶段论》，是从英文直译的，有点蹩脚，让我复述一下，略加解释。杰姆逊是要说，毛泽东搞文革的本意是要发动群众扫荡旧文化，并摧毁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建立一个真正大众民主的社会，人们自由结合的公社就是这个理想社会的组织形式。但是，就在1967年1月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为后台的上海造反派夺上海市委的权，成立新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时候，毛被有“一月风暴”之称的群众造反吓住了，后悔了，所以决定派军队以“支持左派群众组织”为名参与文革，稳定秩序，成立有军

代表、老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即造反派）参加的“三结合”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毛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进而否定“公社”这个有大众民主意味、让人想起“巴黎公社”的名字。在杰姆逊看来，革委会成立是一个转折点，而且是逆转，标志着文革的天折。

杰姆逊的这段评论有很多错误，最主要的是他没有看到，或不愿意相信，毛发动文革的本意不是摧毁党的机构和官僚体制，还权于民，推行大民主；毛的本意是要借文革实现更高度的极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一元化领导）。但是，杰姆逊对文革发展的评估会得到很多造反派的赞同：很多造反派当年憧憬巴黎公社的模式，而且相信那真是毛泽东的理想，只不过旧官僚集团的抵制，一时实现不了（这是杨曦光看法，我将在下一节讨论）。如今，也有很多造反派认为革委会的成立就是复辟旧政权，甚至是军人政权，因为革委会美其名曰“三结合”，实际上造反派成员徒有其名，没有实权，一切都得听军代表的。而且造反派很快就开始被整肃，他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革委会成立之日就结束了。我认为这个说法与那时造反派的地位和境遇并不完全符合，有我上面讨论的造反派在清队运动中的角色为例。总之，诸如杰姆逊的这种看法在造反派中间是有相当的市场，“人民文革”论者甚至可以基本认同他的结论。徐贲说：“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论还只是想从文革中分离出一些有积极反抗意义的部分来。在一些新左派那里，整个文革都被抽象成了具有普遍积极意义的‘人民文革’。”〔34〕此话有理，道出了造反派情结和新左派文革论的不同与关联。

造反派和新左派有共同语言的地方还在于他们对官僚主义或官僚体制的看法。在西方社会，官僚（bureaucrat）这个以桌子或桌布为字源的词是个很不好听的词。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官僚平庸无聊；在卡夫卡笔下，官僚体系是人类异化的荒诞现象。但是，现代社会的运作毕竟离不开由专职行政人员组成的官僚机构，这是一个悖论。然而，如前所述，既然民主制度下的行政机构／官员和极权体制下的行政机构／官员有本质的不同，将西方社会对自身官僚体系的批评嫁接到毛时代的中国，以“官僚集团”取代“走资派”应当也是可以商榷的，因为跨界使用“官僚”的概念实际上混淆了民主与极权的区别，多党制与一党制的区别。

在对官僚阶层的认识上，中国学者还有一个比西方理论更切近的资源，那就是1963年翻译出版、内部发行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作者是很早就对苏式共产主义开始批判反思的南斯拉夫思想家米洛文·吉拉斯。杨继绳在文革史《天地翻覆》中引述了吉拉斯的著名结论：“‘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杨继绳接着写道：“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认为共产政权里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维护斯大林，企图建立一个超越斯大林体制的乌托邦。”毛认为实现这一乌托邦的障碍在于党内的官僚阶级，所以发动文革，使“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35〕杨继绳所说的毛与吉拉斯在基本立场上的分歧，我完全同意。但这段议论中有两点似乎与我讨论的造反派情结问题并非完全没有联系。首先，将毛的对立面称作官僚集团或官僚特权阶级值得商榷，因为从更本质的意义上看，毛既是这个官僚集团的缔造者、领导者，又是最高特权的享用者，而且最后还要用经过文革式的清洗和整肃，使官僚体系更牢固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其次，吉拉斯说的“新阶级”是共产政权产生的阶级，是共产主义革命自身的产物。吉拉斯特意将这个阶级与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加以区分，所以才

“新”，并说：“虽然这个新阶级完成了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其统治方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36）吉拉斯定义的这个阶级并不是毛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或走资派，而是包括毛本人在内的、以专政方式来统治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或党内精英。所以，不如就按毛的说法，把毛的打击对象叫做“走资派”，放在引号内，更何况他们最后证明就是走资派。当然，我认为更为确当的称谓是中共党内与文革派或激进派相对的务实派或温和派。可是，今天如果真这样如实地说：在文革期间造反派群众组织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务实派），也的确挺尴尬的，不是吗？

#### ◇ 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

在文革年代，也许大多数人都是怀着单纯的动机、真诚的意愿和理想主义的热忱参加造反的。这个理想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世界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那时有些理想青年甚至偷越南方边境，去参加东南亚国家的武装斗争，支援世界革命。连生命都愿意贡献，动机不可谓不纯，理想不可谓不高尚。在很多年以后，文革的灾难已经使多数人不再相信当年的理想，但是对理想主义的反思好像并没有开始，至少是远远不够。而且，也许是因为物以稀为贵，理想主义或理想情怀在一个物欲横流、信仰失落的当今中国社会反而更令人憧憬，这种憧憬还与怀旧并行。

我下面会讨论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讨论这个较为宽泛的题目之前，我想先复述一篇被许多造反派推崇的、文革理想主义的代表性的文字，即湖南造反派学生杨曦光（杨小凯）在1968年初写的《中国向何处去》。

“极左”在中国的政治语汇中本是贬义词，是在批评诸如极端的文革思潮时用的。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就提议批判“极左”，实际上是为了抵制极端的文革政策，自然被毛否决。而杨曦光开宗明义，从正面接受这个词，说《中国向何处去》也是《“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他认为：“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这场革命要“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37）他认为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毛的确在不同的场合用过“公社”或“人民公社”这样的概念，比如，他说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但这个新社会的理想尚未实现，原因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或“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阻力太大，而周恩来就是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的“总代表”。

杨曦光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967年末、1968年初——正是各级“革命委员会”逐步成立，而造反派群众组织内部的不同派别正在为争夺权力大打出手的时期（即“武斗”时期）。他认为，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之后，毛的理想权力机构是实行群众专政的“公社”，而不是由军代表、老干部和造反派“三结合”组成的革委会。但是，“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的成立，在杨曦光看来，是毛向势力强大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暂时作出“退却”的步骤之一，是毛的策略。值得指出的是，杨曦光关于革委会中军人和“旧官僚”起主要作用，实际上是旧政权复辟的看法，仍然是当下很多造反派文革研究者的看法。

既然革委会的建立是旧政权复辟，是毛对资产阶级的暂时让步，那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较量就远远没有结束。杨认为，“极左派”结束这场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最终途径是武装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要“武装左派”。杨曦光对1967年形势的分析是，一月造反派夺权受到挫折，二、三月更出现逆流（即毛泽东所指责的、周恩来手下的高层干部掀起的“二月逆流”和造反派学者指出的、在某些省份发生的“二月镇反”），造反派受到严重打击……但到了八月份，形势好转，不仅出现了造反派“抢枪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而且爆发了“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可惜，九、十月份形势再次逆转，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宽松的干部政策让走资派上台，中央下达九·五命令（禁止群众组织抢夺军队的武器弹药，已抢的武器必须限期归还）“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不过，杨曦光说，在这样的曲折反复中，人民也逐渐觉醒，成熟，“极左派”的新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云云）“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与此同时，江青11月12日（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重提批判17年（1949—1966）和50天（1966年夏天工作组时期）的问题，“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林彪10月24日（在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47军军长黎原时）的谈话中“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两个讲话“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杨曦光对江、林二人讲话的解读和评价多有不实之处，往往一厢情愿。但这同我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无关。与我的问题有关的是，他对文革派江青和林彪的推崇与赞美和他对务实派周恩来的敌视与讽刺形成鲜明对照。

杨曦光还认为，“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很可能会“在一省或数省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而这个省他认为很可能就是他所在的湖南，那里最先进的组织就是他所在的“省无联”（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他写道：林彪的“10·24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原文如此）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以上是我对《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要点的尽量客观的复述。从今天的角度看，此文的论点很教条，很荒谬，但这并不是杨曦光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问题。至于杨曦光，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马列主义理论背景，长于推理，以至于对毛泽东的思路有相当洞见的知识青年。我感到不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很多造反派文革学者对这篇脱胎于毛泽东文革理论模式的文章至今仍旧缺乏批判的思考，尽管杨本人早已放弃了当年的看法。2004年，早已更名为杨小凯的杨曦光辞世，悼念文章中仍有不少赞扬《中国向何处去》的文字。例如，刘国凯说：“杨曦光这是个充满着历史内涵的名字，它与那个时代青年社会变革者的心迹和磨难



紧相联结。以这个名字署名的《中国向何处去》是那个时代进步思想的最高结晶。……在多达八亿的人群中，在那个躁动而迷信的年代里，能石破天惊地指出‘红色资本家阶级’业已形成的人有多少？只有一个，那就是年仅十九岁的小青年杨曦光。”〔38〕郑义在纪念文章中引用了杨曦光关于文革基本矛盾和终极目的的那段话，并称赞说：“36年过去，历史已经把他的这段文字精选为文革异端思想最辉煌的经典……这一共产暴政下饱受践踏蹂躏的人们内心深处的秘密渴望，小凯表述得最尖锐最深刻。因此，这位青年思想家，这位英勇的代言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权势者们所谓‘彻底否定文革’，要掐灭的正是以杨小凯为代表的这种‘实现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觉醒。36年过去，小凯的这一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见其光辉。”〔39〕

杨曦光的理想主义应当是单纯而真诚的，问题是，纯洁的动机和真诚的意愿在我们决定某个行为的好坏对错时是否有任何意义？（更何况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人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更重要的是，是不是因其单纯和真诚，这样的理想主义，或任何其他理想主义就一定有价值？

我这里要讨论的不是类似个人对未来所抱的美好愿望的那种理想，也不是与冷漠、犬儒相对，有志于改变现实、改善现实的那种崇高的理想情怀，而是可以成为某种“主义”的理想，或等同于某种意识形态、从某个所谓“科学”理念演绎出的人类发展蓝图。在西方语言中（以英文为例），理想（ideal）、观念（idea）、理想主义（idealism）和意识形态（ideology）同源：希腊文“看见”（idein），进而引申为意象、观念、柏拉图的理念、超验的概念、原型、完善的品格、理想等等。名词后缀-ism起的作用一般是将前面的具体概念抽象化，所以，理想（ideal）加主义（ism）在我所说的这个语境中的意思就是以某一理想为基础而形成的理论或信条，它本身是中性的，关键要看什么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这个词很接近意识形态。但由于人们习惯于将理想浪漫化，不把它与丑恶的东西连在一起，所以理想主义好像总是正面的。意识形态这个词却很不一样，多有贬义，也许是因为历史或使用习惯，也许和这个词的构成有关：这个词由“观念”（ideo-）和“逻辑”或“话语”（-logy）组成，其字面意思是从某一观念或某一套观念作出的逻辑推演。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即某种具体的理想主义。比如从公有制/共有制（common, commune, communization, communism）和阶级斗争（即马克思认定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primitive communism 和科学共产主义社会 scientific communism 之间的漫长历史阶段中社会的基本冲突和发展模式）的概念演绎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从优生学/种族主义（eugenics, racism）、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社会主义（socialism）的概念演绎出的国家社会主义或纳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缩写）意识形态。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并没有明显区别，对于纳粹党人来说，国家社会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理想，不是吗？这基本上是二十世纪的现象，在此之前，有传统的皇权统治（如中国）、封建贵族统治（如早些时候的欧洲）、种姓制度（如印度）、共和制度（如美国）等等。同样是专制，二十世纪之前的专制只控制人的行为，而二十世纪诸如纳粹德国、斯大林的苏联、毛时代的中国、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这样的专政不仅控制人的行为，还控制人的思想。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同领袖信仰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极权主义。在极权社会，理想主义和官方意识形态是一回事。在毛时代的中国，能成为主义的理想，除了共产主义以外还能有别的吗？极权制度与以往的专制制度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思想意识形态控制。纳粹德国和苏联还需要秘密警察，而毛时代的中国，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中国，意识形态统治已经如此彻底，毛泽东思想已经如此“深入人心”，形式上的秘密警察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它已经内化：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秘密警察。

文革时代的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教化，多半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却很难想象纳粹德国的大部分民众也是理想主义者。为什么不是呢？共产主义者相信，消灭了所有的阶

级敌人以后，无产阶级就会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纳粹相信，消灭了所有劣等民族和残疾者以后，雅利安人也会实现人类的乌托邦；这两者之间在逻辑上有本质区别吗？共产党人说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要为人民服务，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云云；纳粹说人民就是一切，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据统计，Volk，即“人民”或“大众”，是希特勒最常用的词之一，连第一辆大众牌汽车 Volkswagen 都是按希特勒画出的样子设计的，希特勒说这种车必须便宜、省油、能载五人之家，所以称它为“人民 / 大众的车”）。这两个“人民”都是以同化个性、排除异类为前提的。

但是历史已经显示：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给人类带来了几千万生灵涂炭的灾难，因为这两种革命理想主义的“首要问题”都是辨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决不手软。这里的敌人和战场上的敌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战场上的敌人也是人，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把自己的敌人定义成为了实现其理想而必须消灭的异类或非人。于是有了用于敌人的诸如犹太猪、寄生虫、毒瘤、细菌、牛鬼蛇神、狗崽子、害虫之类非人化的指称。假设人对同类都有恻隐之心，对同类施暴被看作恶行。然而，一旦敌人被非人化，不再被视为同类，而且被认为是通向理想道路上的障碍，向他们施暴，甚至杀戮，就有了正义性，是革命行动，施暴者不会有任何顾虑。因此就会有像 1938 年冲锋队向犹太人施暴的“水晶之夜”，1966 年红卫兵对所谓阶级敌人大打出手甚至杀害的“红八月”和以 1968 年为高潮，造成遍地“牛棚”、遍地冤狱的清队运动。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结果显示，这些受难者几乎全部是无辜的。在纳粹统治时期，欧洲有近六百万犹太人被害，多半死于集中营。文革期间，有大约一百七十万所谓的阶级敌人死于非命（或被杀害，或被折磨死，或自杀；死于派性武斗的人占的比重并不大），他们中的大多数死于“群众专政”，也就是杨曦光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取代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的理想权力机构，与“公社”同义。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德国的三十年代与中国的六十年代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中能够侥幸读到内部发行的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译本的人受到很大震动，从而开始反思中国的文革。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两种反人道的理想主义。了解了这两种思潮的具体内容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反人道的理想主义”并非自相矛盾的说法。这样的理想主义的确会让信仰者迷失人性，甚至失掉对生命的敏感。我想以《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一个细节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如前所述，作者在文章里推崇林彪的 10·24 讲话，在不同的地方提到过四次，想必是认真读过的。林彪讲话实际上是听 47 军军长黎原和省革筹小组成员汇报湖南局势时的插话，并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数位高层领导人在座。汇报的内容包括 1967 年夏末秋初的道县惨案，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九千多无辜百姓，多半是所谓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和子女，在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惨遭屠杀，对此林彪和谢富治在听汇报时均有评论。在场的黎原是个关键人物：他是军人，否则林彪不会出现；他还是直接过问道县及零陵专区“乱杀风”的高级将领，“乱杀风”就是他派遣的 47 军 6950 部队去制止、平定的。况且，47 军是野战军，在执行支左任务的时候，与保守的省军区及其下属的地方武装部相对，是相当同情造反派群众组织中较为激进的一派的。尽管如此，杨曦光仍从他的极端理念和派性意识出发，将他认同的“极左派”造反派等同于“人民”，强调“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47 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完全不考虑 47 军在稳定秩序，保护生命，制止“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之类“群众专政”残害生灵等实际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似乎道县惨案受害者的生命完全在他的视野之外，在“人民”之外。

人命关天！也许二十世纪的历史给我们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我们曾被某种理想主义误导，为了某种貌似高尚的理想，我们可以去牺牲自己，也可以去杀害他人（因为他们被看作我们实现理想的障碍）。

从噩梦中醒来以后，我们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守住底线：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种族、什么信仰、什么派。

#### 注释

- 1，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 2，《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8日通过），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2013）。下文中有关中共中央文件及文革期间毛泽东指示的引文均出于此文库。
- 3，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王希哲论文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
- 4，郑义：《历史的一部分——永远寄不出的十一封信》（香港：万象图书公司，1993）。参见萧喜东：《“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文革博物馆通讯zk9604d。
- 5，刘国凯：《人民文革论》人民文革丛书卷四（香港：博大出版社，2006），页9。
- 6，徐贲：《群众和“人民文革”》，《记忆》2009年第五期（总第十五期）。
- 7，郑义：《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40周年》（2006），文革博物馆通讯zk0606f。
- 8，罗四鸰：《“六四”后监狱里创作出的〈毛时代的爱情〉》，纽约时报中文版2016年4月7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0407/cc07liaoyiwu/>。
- 9，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
- 10，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
- 11，毛泽东：《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1—12日），宋永毅等编《中国大跃进一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3）。
- 12，徐友渔：《“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在“中国近代史研讨会”上的发言），文革博物馆通讯zk1111b。
- 13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
- 14，同上，页14。
- 15，丁抒：《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2004），文革博物馆通讯zk0412b。
- 16，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
- 17，周伦佐：《文革中造反与保守的根本区别》，《记忆》2009年第五期（总第十五期）。
- 18，陈益南：《〈青春无痕〉韩文版序》，《记忆》2009年第五期（总第十五期）。详见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
- 19，陈益南：《文革中地方基层政权的变动情况与历史责任》（2004），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188>。

- 20, 秦晖:《“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上册)(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页20。
- 21, 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1)。
- 22, 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Volume 2: The Syntax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188-207。
- 23,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9。
- 24, Arif Dirlik,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 Vol.3, No.2 (summer 2003) 241-270; 德里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页4-15。
- 25, Liu Kang, *The Problematics of Mao and Althusser: Alternative Modernit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Marxism*, fall 1995, 8:10; 刘康:〈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10月号,页145; 刘康:〈全球化“悖论”与现代性“歧途”〉,《读书》,1995年7月号,页105。
- 26, Zhang Xudong, *Nationalism, Mass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Strategie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Social Text* 55 (Summer 1998): 118, 138。
- 27, 张旭东:《重归总体性思考,重建中国认同》,《社会观察》,2011年第9期。
- 28, 崔之元:《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亚洲周刊》,1996年5月26日,页47;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4年8月号,页7。
- 29,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 30, 汪晖:《自主与开放的辩证法:关于60年来的中国经验》,《21世纪经济报道》国庆特刊,2009年9月。
- 31, 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
- 32, 高达乐(Claude Cadart):《法国式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1966—1979》,《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10月号,页24-31。
- 33, 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Volume 2: The Syntax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188-207。
- 34, 徐贲:《群众和“人民文革”》,《记忆》2009年第五期(总第十五期)。
- 35,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 36, 密洛凡·德热拉斯着,陈逸译:《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页62。
- 37,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中国向何处去?》,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3)。
- 38, 刘国凯:《“造反派”公案未了,杨曦光,你不能走》(2004),文革博物馆通讯 zk0408b。
- 39, 郑义:《纪念自由的呼唤者杨小凯》(2004),文革博物馆通讯 zk0408c。

~~~~~

【亲历者言】

毛泽东说：武装上海十万工人——砸上柴“联司”的前后经过

• 徐景贤 •

（一）

我接触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简称）的问题，最早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那时上海的形势相当乱，张春桥、姚文元刚从北京到上海不久，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张春桥让他的秘书何秀文打紧急电话到武康路二号，说有两个人闯入他们住的兴国路招待所（现今的兴国宾馆），叫我去处理一下。

◇ “联司”人员夜闯兴国路招待所

那天已快到半夜了，我急忙骑上自行车，赶到那里。进了兴国路招待所的边门，只见门里面吵吵嚷嚷，张春桥的秘书和部队的军官、值勤的解放军战士，围着两个人，正在跟他们争论。何秀文打电话通知时要我以群众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出面，所以我就走上前去对那两个人说：“我是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其中有个人认识我，很快就叫出我的名字：“你是徐景贤。”他介绍自己说是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的。

我说：“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说：“我们要见中央首长。”

我问：“你们怎么会找到这地方来的？”当时张春桥、姚文元住的地方是非常秘密的。

那两个人不肯讲，他们坚持说：“我们到这里要向中央首长汇报情况。”

正在我们对话的时候，“工总司”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来了，他也是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叫来的，张春桥要我们两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出面劝阻那两个人。

耿金章对他们态度很凶，说：“这地方是禁区，你们怎么可以闯进来？”

通过问答，才知道他们是翻墙进来的，当时墙上筑有铁丝网。他们翻进大院后，见院里是一个大花园，分布着好多幢楼，不知中央领导人住在哪里，就挨家挨户地找。文革以前，兴国路招待所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来上海时住的地方，守卫得很严密。本地的来访者要见中央首长，都要从大门口先打电话进去，然后由里面派人出来接。那两个人在里面闯了半天，没有结果，最后被解放军战士带到门口传达室。

耿金章和我两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耿金章很凶，我比较温和，一起劝他们回去。他们坚持了很久，看来见不到中央首长了，便留下单位、姓名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说是要向中央首长反映上海柴油机厂两派的问题。

我等那两人和耿金章走了以后，就跟何秀文一起到里面看望张春桥。张春桥住在五号楼，见了我们的面他余气未消，恼怒地说：“解放军根本没用处，那两个人居然可以翻墙头跨越铁丝网到院子里面来，解放军根本不敢碰他们。他们一幢楼一幢楼寻找，到了五号楼，我正在看文件，听到外面要找人，就把灯关掉了。只听见他们走近来，说要找中央领导，解放军跟他们对话，就在我窗下纠缠了好久，才把那两人劝到外面去。解放军说要保卫我们，

到关键的时候，连枪也不敢开。”我当时想，这两个人并没有谋害领导的意图，开枪总是不行的。

张春桥又说：“我已经问过了，这两个人是怎么会来这里的？”原来上海警备区政委李世焱和副政委李彬山，知道中央首长张、姚住在这里，代表警备区来看望。他们出门的时候，正好碰见那两个人，两人看到年纪很大的解放军首长从里面出来，就把他们堵住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两位政委告诉道：“这里是中央首长住的地方，你们不要随便闯。”他们一听便来劲了，兴国路大院门口警卫森严，无法进去，他们就绕道到后面，翻过围墙跨过铁丝网，闯入院里。当天只知道他们是上柴“联司”这一派的，因为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也就算了。

但到后来，当上柴“联司”和上柴“东方红”（“东方红兵团”）两支造反派的矛盾更加尖锐的时候，听说这件事也变成“联司”的一条罪行，有人宣称上柴“联司”的两个人，在张、姚到达上海没几天，就半夜翻墙直闯张春桥、姚文元的家里。实际上张春桥、姚文元的家在康平路大院里，那两个人到兴国路只是为反映情况而已，根本称不上什么“罪状”。

◇ “联司”提出“改组”上海市革会

此后，我们就开始注意上柴“联司”和上柴“东方红”的矛盾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我正好在张春桥、姚文元住处汇报工作，王洪文打电话来报告，说他已带了好多人冲到上柴厂去。据说那天厂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武斗，还抓了人。当时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清楚上柴两派究竟是什么关系，只是对王洪文讲：“不要造成重大的伤亡。”其实这时王洪文和“工总司”已经介入到上柴两派的矛盾中去了。

后来，我们问王洪文是怎么回事，他说：“‘联司’和‘东方红’两派都宣称自己是造反派，主要是上柴厂里的两派在打倒谁、解放谁和结合谁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在谁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上有争论。”据说这种争论一直牵涉到八机部。对这些是非我没有时间去弄清楚，也没有认真去研究过，因为当时正值上海夺权初期，我实在太忙，顾不上去详细了解。

之后，上柴“联司”一派来找我们，上柴“东方红”一派也来找我们，他们都认为市委机关联络站是张、姚的办事机构，都想争取我们的支持。果然，市委联络站的工作人员中有同情“东方红”的，也有像郭仁杰那样同情“联司”的。我的态度是：哪个地方发生两派矛盾的时候，不要去支持其中一派。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在上柴“联司”和“东方红”的问题上一直是比较超脱的，没有发表过意见。

等到交通大学“全向东”（一个年轻教师汤福坤的化名）与上柴“联司”结合后，不断在社会上发表言论，才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上柴这么一个大厂，又有军工生产，两派对立很激烈，影响了生产，特别是军工任务。我们派部队的军宣队进去，不久军宣队很快地宣布“东方红”是左派，“联司”当然不满意，他们就把军宣队办公室砸掉了。部队报告公安局，公安局抓了两个砸办公室的人。这样一来，“联司”更不满意，组织人到市公安局静坐，从此就把上柴“联司”的问题闹到社会上去。

上海“一月夺权”以后，很多基层单位都存在着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不同的群众组织都打着“造反”的旗号，宣称自己是“左派”，压制对立派，大搞派性，唯我独“革”，大权独揽，不想和对方联合而只想把对方打下去。而王洪文等指挥的“工总司”又往往支一派、打一派，得罪了很多。于是，受压的、丢权的或是失意的组织，对市革命委员会、“工总

司”和“支左”部队有意见，或是心里有气，现在正好趁着上柴“联司”敢于向市里挑战，就纷纷表示支持“联司”，还成立了一个全市性的组织：“支援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络总站”（简称“支联站”），把各种对立力量都纠合起来了。

“联司”把矛盾闹到社会上来，使我们很伤脑筋，这影响到我们夺权以后的秩序问题。“联司”派人到市公安局静坐以后，我们不断地要市政法指挥部出面解决。市政法指挥部发了好几个通告，但都不能平息矛盾。因为市政法指挥部是市革命委员会的所属机构，“全向东”他们认为政法指挥部偏袒上柴“东方红”，开始把不满言论指向市革命委员会。从五月份开始，我们收集了好多有关“全向东”的言论，他的中心意思是：，上海市的政法机关对上柴“联司”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必须改组负有领导责任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时《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批评“联司”的做法。“全向东”又批评《解放日报》、《文汇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而且说上海政宣部门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因为对宣传工作不满意就把矛盾扯到我头上来了，当时我在市里的排名在王洪文的前面，所以“全向东”在七月份提出一个说法：“徐景贤、王洪文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且鼓动一批群众冲击学生组织“红三司”。比较严重的事件是有人放火焚烧西藏路的光明中学。双方大辩论的时候，还有人把南京路上一辆同情上柴“东方红”观点的人驾驶的摩托车推翻，点火烧毁，不料被住在和平饭店楼上的外国人拍了照片，在国外报刊上登了出来。我看到了国外的报道和照片，很生气，认为这样做就是要搞乱上海。所以我当即下达指示，要《文汇报》、《解放日报》收集“全向东”和上柴“联司”的言论，编成几版报纸版面，加上批注，夹在《文汇报》、《解放日报》里发行，对“联司”发起凌厉的宣传攻势。

◇ “联司”和“阿东”形成两大派

“联司”受压以后，提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口号。当时正值夏季，天气炎热，双方就利用晚上乘凉的机会，在人民广场设台辩论，支持“联司”的和上柴“东方红”（简称“阿东”）的辩手都很活跃。群众去那里观看热闹，进场时有人首先要问你是支持“阿东”的还是支持“联司”的？人民广场上就像过去上海说唱“小热昏”的架势，搭起了舞台，每天晚上双方对着干，展开大辩论，热闹非凡。

当时上海势力较大的是一批在市里掌权的造反派，以“工总司”领衔，另一批是在野的造反派，“联司”就是其中的代表，此外还有“工总司”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的一些下台的头头，曾经挨过整，还有学生组织“炮司”的一些人，“红革会”的一些人，都受过打压。于是各种各样没有掌握权力的造反派，在社会上借“联司”的问题形成了一股力量。事实上，当时被打倒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都不敢挤进这个队伍去，“挺身而出”参加大辩论的人都打着造反的旗号，包括“联司”也宣布自己是造旧市委的反、造陈丕显、曹荻秋的反的，他们的口号是：“市革命委员会必须改组！徐景贤、王洪文必须从市革命委员会滚出去！”，他们又从南京路市百一店高楼上挂下来几条大标语，上面写着：“打倒陈、曹黑秀才！”群众一看，就知道是要打倒徐景贤的，因为我造反以前还在给原市委起草文件、代曹荻秋写检讨报告。现在“联司”就制造舆论，把我划到陈、曹一边去。

在六月份的时候，“联司”在厂里又搞过一次武斗，还冲击了上海市青年宫。市革命委员会为此发了一个《六·二九通告》，明确提出要制止上柴厂的武斗，把“联司”放在被告的地位上。“联司”当然很不服气。

七月一日，王洪文决定由“工总司”出面联合各个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开了一次大会，声讨“联司”和支联站。我与王少庸、马天水、王承龙、王洪文商量，觉得“联司”这样搞

下去，会把上海搞乱。因为各区、各系统的“支联站”都纷纷成立，上海从此有可能分裂成为对立的两大派，这是我们最担忧的事情。所以我们赞成王洪文声讨“联司”的行动。

《六·二九通告》以后，我们邀集上柴“联司”和“东方红”两派的头头到衡山饭店谈判，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全去了。我记得，“联司”的负责人杨仲池来了，他是一九六二年的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生，分配到上柴厂后成为技术骨干，现在是“联司”的头头，“东方红”的负责人也来了，但是“联司”的代言人“全向东”没有来。我们在会上提出的方针是：两派在本单位辩论是可以的，但是双方应该求大同、存小异，争取联合起来，而且不能发生武斗，不能把另一派的人赶到厂外面去。那天双方争论不休，谈判没有结果。

那时，“东方红”这一派在厂里留不住了，住到外面。厂里变成“联司”一派了。局势有一触即发的危险，还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市革命委员会的几个领导商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决定再放下一次架子，登门去跟杨仲池谈判，希望他们先让“东方红”的人回到厂里，然后在厂里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双方要继续抓生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

那天我们认为直接去上柴厂是相当冒险的，王洪文没去，因为“联司”对他意见很大，怕他去了会出事情。去的是我、马天水、王少庸、王承龙四人，每人后面只跟一个警卫员。我们闯到“联司”总部，杨仲池在那里接待我们。当时杨仲池非常傲气，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居然敢于对市革命委员会持这种态度，从没见过过。我们心里很生气，但都忍住了。杨仲池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错在“东方红”这边，他们是正确的，指责市革命委员会拉一派，打一派，支持一派，反对一派。但是最后他终于同意让“东方红”那一派回厂。

“东方红兵团”的成员回厂不久，又出了一个七月十八日事件。因为双方把大字报贴来贴去，发生了冲突，酿成武斗。观点倾向“东方红”的工具车间工段支部书记解福喜在武斗中被打死，矛盾马上激化。王洪文抓住这个机会，七月二十一日在人民广场开了一个大型追悼会，追悼大会结束后，又举行全市卡车大游行，在第一辆大卡车的前面挂了一幅解福喜的大照相，企图在全市造声势。

这时，“联司”也发了一份备忘录，为打死人辩解。我们请法医做尸体解剖，尸体上伤痕累累，我详细地看过尸体解剖的照片，我认为这个解剖是可信的，结论是武斗重伤致死。但是在“联司”的备忘录里，说解福喜是因疾病或者中暑而死。我当时觉得“联司”的态度很不对，文过饰非，这个组织在武斗致人死亡后还要抵赖，是完全错误的。

（二）

◇ 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

“七·一八”事件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导致八月四日上柴“联司”的被砸掉。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砸“联司”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应该和全国形势的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当时全国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即“七·二〇”武汉事件。毛主席当时在武汉，武汉的两派矛盾激化。“百万雄师”这一派得到了武汉军区和司令员陈再道的支持，包围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住处。毛主席的住处正好在王力的隔壁。王力出去跟激动的群众说话，群众认为他支持另一派，把他打伤了。当时的中央担心毛主席的安全，林彪很紧张，认为陈再道可能搞兵变，所以他和江青一起建议毛主席转移到上海来。说来也巧，正当毛主席到上海的时候，上柴厂出了解福喜被打死的事情。中央认为毛主席在武汉的安全受到威胁，由周恩来总

理到武汉紧急安排毛主席撤出。中央原来已经有过决定：为了保证安全，今后毛泽东外出不能乘飞机，所以他从北京到武汉时乘的是专列。但是这次紧急撤出时又乘了一次飞机，这是毛在一生中最后一次乘飞机，从武汉直接飞到上海。毛主席是在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两点抵达上海的，这一天，人民广场正好召开上柴厂被打死的解福喜的追悼大会。毛主席来后住在上海西郊虹桥路的“四一四招待所”（今西郊迎宾馆），上海当时的重大任务，就是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

七月二十二日，河南发生大武斗，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二七公社”负责人时，明确肯定了“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当时林彪、江青都主张造反派要掌握武力，不仅要文攻，而且要武卫。林彪、江青后来把陈再道召到北京，进行批斗，并在武汉把“百万雄师”这一派压下去了。

张春桥是陪同毛主席从武汉飞到上海的，他特地把江青接见河南“二七公社”负责人的详细谈话记录用文件的形式批转给我，同时告诉我，这个记录可以散发。我就把江青的谈话印成传单，夹在《文汇报》、《解放日报》里发行。我觉得当时中央的方针非常强调“文攻武卫”，支持造反派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武。

毛主席到上海以后，七月二十三日，我们在人民广场开了一个“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大会，完全是针对武汉事件、河南大武斗，包括针对上海上柴“联司”和“支联站”的。七月三十一日，王洪文通过他掌握的公安局杨浦分局，搞了一次秘密的突击搜捕，把正在泰安路“支联站”总部开会的“支联站”头头二十五人全部抓获，把其中的十四人送交市公安局关押，但“全向东”没有到会，未能抓到。当时，游雪涛领导的秘密组织“扫雷纵队”派人打进了“支联总部”，掌握了他们的动向。所以，“支联总部”是首先被解决的。

七月二十九日，上柴“东方红”的队伍全部撤出了工厂，为以后的“踏平联司”创造了条件。八月三日，由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起草，经过我改定，经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发出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致上柴‘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市革命委员会是当时上海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权力机构给一个工厂的群众组织的成员写一封公开信，本身也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当时认为对“联司”已经仁至义尽了，找它出厂谈判不行，上门去谈判也不行，市政法指挥部又控制不住他们的行动，最后一招只有向他们的群众写信了。市革委常委扩大会议在讨论这封信的草稿时候，也颇有争论，比如“工总司”陈阿大坚决不同意在信中提“联司”是群众组织，主张一定要宣布“联司”是反革命组织。我说服他：“联司”还是群众组织，“联司”的群众我们还应该称他们是“革命群众”，希望他们能够起来与“联司”的头头决裂。

《公开信》印成大布告的形式，派专人直接送去上柴厂。当时的做法也很特别，由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派干部乘着三辆大卡车，拿着公开信，还通知新闻记者、电影厂的摄影师一起去，看“联司”怎么应对。到了厂门口，“联司”完全把市革命委员会作为对立面，不让进厂，送信人就在车上用高音喇叭广播《公开信》，结果“联司”派人把高音喇叭砸了，把电影摄影机夺走了，打了摄影师，还把几个送信的代表带进去教训一顿。三辆大卡车被砸，实际上是“联司”中了我们设下的一个圈套：市革命委员会给你写信，你居然敢对于市革会派出的代表动手，这说明“联司”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市里对它采取进一步行动就有充分的理由了。

◇ 王洪文决定动手砸“联司”

八月四日凌晨三点，王洪文在华山路八百八十八号召开“工总司”全体委员的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上柴“联司”动手。我觉得要动手的话，一定要经过张、姚批准。我当时多次打红色保密电话找张春桥，但他陪毛主席去了，不接我的电话。我把紧急请示告知他的秘书，秘书答应转达，但张春桥始终没有回复。没有他的批准，我是不敢下最后动手的决心。估计是他有意不表态，让王洪文出面放手去干。

王洪文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等找到华山路888号参加作战会议，他们把杨浦区的地图摊开，在上柴厂的周围标出了很多作战点，对厂房、仓库、水塔、食堂，甚至上柴厂沿黄浦江周边的区域，都作了详细的作战部署。因为怕“联司”成员从黄浦江上转移出去，特地从港务局调了几艘巡逻艇，把江面封锁起来。

部署完毕，王洪文已经等不及张春桥的批准令了。

王承龙作为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参加了华山路八百八十八号的作战会议，他根据我们商定的意见对王洪文说：“这么重大的行动要春桥、文元同志批准，我们还是等一等好。”

“不管了，动吧！”王洪文自己拍板了。凌晨，上海的各个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举行誓师大会。会后，浩浩荡荡的队伍乘着一千多辆卡车向上柴厂进发。

我记得，八月四日那天天还没有亮，王承龙气急败坏地冲到荣昌路六十号市革会专题工作组，紧急敲我卧室的门：“快起来！老徐，快起来！王洪文他们已经调队伍打‘联司’去了！”

我很着急，张、姚都没有表态，怎么办呢？我赶到康平路办公室，王少庸也被从睡梦中叫醒，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当时王洪文又下令从杨浦区大厂调队伍，最初调四万人，后来有些单位听到消息就自己跑去了，加起来有十几万人。军工路上塞满了人和车，各种各样的车辆载着工人，他们拿着钢钎、铁棍，戴着柳条帽，穿着帆布工作服。钢铁系统的造反派最先赶到上柴厂，充当了打头阵的队伍。在现场指挥的是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和王腓利。我让王承龙一定要跟他们在一起，并下了一个命令：决不能打死人！我最担心的就是武斗死人。上柴厂解福喜一死，对“联司”很不利；假如这次在打“联司”的过程中，“工总司”这边也打死人，事情就会更复杂化。我处理过一九六六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工总司”与赤卫队大武斗，只是伤人，没有死人，后遗症就少些。所以我要王承龙带去一条死命令：打“联司”不能打死人！我和王少庸、马天水没有去上柴厂现场，我们守候在市委康平路小礼堂听取消息。

王洪文他们在上柴厂外围的工农新村，找了间有电话的房子作为指挥所。除了陆上包围以外，还调来舰艇，从黄浦江上断了“联司”的后路。开始的时候，双方都采取宣传攻势，打“心理战”，高音喇叭对高音喇叭。最前沿的是几十名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文攻”。外面对里面广播：“‘联司’必败！‘东方红’必胜！”还策动“联司”广大战士起来造“坏头头”的反；里面对外面广播：“‘工总司’镇压‘联司’绝没有好下场！”而且口号提得很策略：“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阶级不打工人类！”王洪文听了大为生气，下令：“把里面广播喇叭的电源切断！”有人立即通知供电局切断厂区电源，结果里面的喇叭不响了，外面照样广播。

“联司”制造的弹弓威力很大，他们在厂部办公楼屋顶平台上树起一根根水泥柱子，系上很粗的橡皮筋，用洋元（铁棒）锯成一段段铁块当子弹，像一段段胡萝卜块，通过橡皮筋

向厂外阵地弹射出去，射程很远。这些弹弓像一挺挺机关枪，很具杀伤力。“工总司”戴立清在前沿指挥的时候，一块洋元打到他胸前，把衣服口袋里的钢笔都打断了。他后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说：“幸亏钢笔保护了你，不然，胸口肯定要受伤。”里面发射的“子弹”把外面的高音喇叭也打坏了。外面有些人想冲进厂门口去动手，但里面楼顶上守着很多人，不断朝外扔石头、铁块和自制燃烧瓶，甚至喷射镪水和硫酸，使进攻者无法逼近。上柴厂的围墙也很厚，一时难以突破，后来从外厂调来四辆二十五吨的大型吊车和铲车，从侧面撞墙，墙倒下以后，外面的队伍冲了进去，开始了逐屋争夺战。“联司”人员死守，进攻队伍攻下了食堂、酸洗车间、铸工车间、冷锻车间，冲进了三十米高的金工车间、大马力车间、油泵车间，战斗十分激烈。

（三）

◇ 电影摄影师拍下砸“联司”的全过程

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姓殷的摄影师和我比较熟悉，他在随市革命委员会代表给“联司”送《公开信》时已经挨过打，对“联司”有一肚子气，这次他带着电影厂“敢死队”跟着最前面的队伍一起冲进去，爬到厂内的制高点，用好几部摄影机居高临下地同步拍摄，把砸“联司”的过程原原本本地拍了下来。这就是后来制作完成后放给毛主席看的一部长纪录片。

队伍冲进去后，办公区的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很快就被占领了，只剩下四号楼，是一幢多层大楼，也是“联司”总部。他们在楼上搞了一套装置，配备有钢瓶，带着喷雾器一样的喷嘴，喷射强酸。他们为坚守准备的砖头、石块、铁块也很多。队伍攻到四号楼，久攻不下。正在这时，旁边的木模车间又失火了，大家一边忙着救火，一边继续强攻。当时进攻者的武器只有铁棍、长矛，枪倒是没有发。攻势很猛，四号楼里的人终于抵挡不住，一层一层地由下往上撤退，最后退守到屋顶平台上，把上平台的楼梯封死。于是，进攻的人只能从墙外的落水管爬上去，爬到平台边缘，守卫的人又将他们推下来。当时消息报来，我认为肯定已经跌死了好几个人。每掉下一个人，王承龙就在现场给我打电话，我说：“完了，又死了一个！”

四号楼久攻不下，但旁边木模车间的失火、救火，启发了进攻者的灵感。正在现场的“消革会”（“消防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司令吴大炮很起劲，很想在这场战斗中立功，他下面还有一个“义革会”（“义务消防队员革命造反委员会”），这两个组织在当时都是很有实力的。一声号令，他们调来十七辆消防车，把四号楼团团围住，长长的云梯架上去，把四号楼屋顶平台包围起来，准备用高压水枪攻击。谁知下边把消防带接上后，高压水枪里的水却放不出来，原来进攻前给高音喇叭停电以后，厂里的水源也中断了。消防队赶紧从一千多米远的一条河浜里接水，云梯上的多支高压水枪（又名“大炮水枪”）就对着四号楼屋顶平台上的守卫者猛烈喷射，守卫者被一百多磅的水柱冲得稀利哗拉，无法招架，消防队员就乘机从云梯上跳下去，在屋顶平台上举起消防斧头劈打。趁着守卫者混乱之际，进攻者们大批蜂拥而上，解决了最后一个据点。

工厂里最高的烟囱上还飘扬着一面“联司”的旗帜，进攻队员又爬到烟囱上把它拿下来，这就象征着攻坚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参加打“联司”最卖力的是两个厂的工人造反队员：上海矽钢片厂和上海铁合金厂，后来这两个厂成为上海“文攻武卫”民兵组织的基干厂。当时，我关照在现场指挥的“工总司”戴立清，不能打死人，他在那里指挥时一再提醒进攻者，不要打俘虏，但是实际上动手打的人很多。被俘的“联司”成员，男的上身衣服被扒掉，赤身露体挨打。“联司”的头头杨仲池也被抓到了，听说是在地下室里揪出来的。从

电影镜头里看，杨仲池被打得很厉害，双手抱头，口吐白沫，押送时一路上有人揪他的头发，拳击他的两肋，连在两旁保护他的人也挨了打。整个战斗从上午十时左右发起总攻，到最后清扫战场、押送俘虏，已是傍晚六点钟了。

我最关心两件事：第一，到底伤亡如何？死了几个人？戴立清按我的要求一个人一个人清点，包括从屋顶平台上跌下来的，受伤送到医院去的，清点下来他给我打电话说没死人。我不相信，他说：“我已经点了两遍了。我现在吃力得连路也走不动了，就是一个也没有死。受伤是有的，还不少。”我想，如果没有死人的话，对外、对上都好交待。“联司”的“俘虏”当夜都被转移到交通大学，我还是不放心，特地赶到那里去看过，多方打听下来证实了确实没有死人，终于舒了一口气。第二件事情，我关心全部武斗的过程拍下来没有？我叫上海电影制片厂赶快把片子洗印、剪辑、整理出来，随时准备调用。

◇ 毛泽东巡视上海并观看砸“联司”的纪录片

当天深夜，毛主席在上海知悉了刚发生的这场大规模的武斗事件，他便说要到外面看看。毛主席从虹桥路的“四一四”招待所，坐上一辆苏联造的钢甲防弹轿车出发。这车原是斯大林送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吉斯牌，混身黑色，车身厚重，北京有好几辆，上海只有一辆。毛主席到上海总是由固定司机开车，司机就是市委车队队长老刘。车窗上装着厚厚的保险玻璃，车身用两寸左右的厚钢板做成，不要说手枪射击，连机枪、手榴弹都打不进去。当时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对群众是绝对保密的，轿车从“四一四”招待所开出，向闹市区驶去，毛主席坐在后座，窗上有薄纱挡住，他可以透过车窗向外张望。

张春桥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的车子开到外滩时，曾被人家发现过。当时在毛的轿车前、后各有几辆北京吉普负责保卫和开道，车队开到一个路口，不知怎么搞的，旁边路上有一辆卡车突然插进北京吉普和毛的轿车之间。毛坐在轿车后座，可以看到前边插进来的一辆卡车的后部，坐着几个装卸工人，他们居高临下朝后张望，有一个工人发现后边一辆轿车上坐的好像是毛主席，赶紧同旁边的人说了，还向轿车里指指点点。同车的中央警卫局警卫人员紧张起来，马上递给毛主席一张报纸，假意读报把脸部遮起来。那几个人万万没有想到车上真会是毛主席，隔着保险玻璃也看得不很清楚，有点吃不准，事后才没有把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传开去。张春桥后来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连连说：“好险，好险。”

毛主席的车在外滩黄浦江边缓缓行进，当天参加武斗的人还没完全散尽，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很多。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大门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手拿钢钎、头戴柳条帽、身穿工作服的工人造反派。原来在市革会大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反而不显眼了。毛主席的车慢慢绕过市革命委员会大门口，他这边看看，那边瞧瞧，目睹了这个经历了一场大武斗以后的城市夜晚的紧张情景。

第二天，张春桥通知我：“你赶快在电视台里面播放昨天拍的片子。”电影纪录片拍出来以后，电影厂已经连夜洗印、剪辑好了，我赶到电影厂去先审查一遍。影片长度为五十分钟左右，完全是现场实录：武斗双方门口对峙、弹弓射击、铲车撞墙、逐屋争夺、喷射硫酸、失火救火、云梯进攻、半空开战、屋顶互殴……直至杨仲池被抓、殴打俘虏等等，全部过程历历在目，看得人惊心动魄。我布置上海电视台当天晚上播出这部片子，把播出的时间告诉了张春桥，由张去转告毛主席的随从。后来，张春桥又通知我让电视台播放过两次，一共放了三次。张春桥对我说，毛主席通过电视观看了这部影片，还称赞云梯上的那些人真勇敢。张春桥说，毛主席看得非常有兴趣。

后来有的文章里说，毛主席是不赞成上海砸“联司”的，理由是毛主席回北京后，发表了在上海作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根据我的了解，事实真相却不是这样的。毛主席看了砸“联司”的纪录片以后，我们都很兴奋，王洪文因为指挥这次武斗尝到了甜头，认为上海工人造反派很有战斗力，建议以上海矽钢片厂和铁合金厂民兵团为基础，重建上海民兵组织，改名叫“文攻武卫”。当时我们认为文革以前上海的民兵路线是不对头的，不仅上海，全国也是这个情况，民兵没有战斗力，用两句话可以概括：“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所谓“墙头上的官”，就是民兵干部的名单都贴在墙上；“抽屉里的兵”，就是民兵的花名册都锁在人民武装部的抽屉里，民兵难得训练，打实弹的机会更少。张春桥则认为民兵都是“花架子”，没有实战能力。于是，他趁打完“联司”这个机会，向正在上海的毛主席请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

毛主席回答：“武装上海十万工人。”

张春桥问：“可不可以发枪？”

毛主席说：“每人先发一根棍子。”

这是当时两人的对答，张春桥向我们传达的原话。有人刨根问底，对当时有没有发棍子特别感兴趣，实际上，建立“文攻武卫”组织的工厂里都有钢钎、铁棍，磨尖了就变成人手一根的梭镖，根本用不着逐级发棍子。棍子是没有发，但是过了几年还是给上海“文攻武卫”队伍发枪了。

根据毛主席的表态，张春桥当时正式写了一份重建上海民兵的请示报告，毛主席圈阅后，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成员都跟着圈阅，表示同意。上海民兵就改成了“文攻武卫”，人民武装部也改成了“文攻武卫”指挥部，王洪文就这样当上了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毛主席视察了“八·四”大武斗以后的上海的夜晚，又看了“工总司”调动三十万工人武装砸掉“联司”全过程的纪录片，他觉得上海的形势和他刚离开的武汉的形势大相径庭，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的武装完全能够左右和掌握上海的局面，所以他才下决心武装十万工人，而且同意重建上海民兵。这正好说明：毛泽东是完全同意和坚决支持上海打“联司”的行动的。

◇ 砸“联司”的实质是两派权力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离开上海的时候，上海、武汉的大局已经稳定。毛走的时候，不再乘飞机，而是从上海乘专列回去的。虹桥机场边有一条专线，专列就停在这条线上，这条专线的外面是大围墙，有铁门可以把专线的入口封锁起来。专线的月台和车门的踏步是平齐的，用不到跨步上车，适宜于老人登车。那天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很高兴，让所有的随行人员，警卫、护士、医生以及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张春桥等，都围在他旁边，在车站上拍照留念。张春桥后来把这张照片拿给我看过，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所见到的张春桥和毛主席唯一的合影。

砸掉“联司”后，北京和外地的红卫兵对上海的反应很大，有些人公开支持“联司”，指责上海“工总司”调动武装血腥镇压“联司”。八月二十日，张春桥到北京，在会上表态说：“‘联司’要上海大乱，这样的局面怎么能够维持下去呢？上海出动工人武装砸掉‘联司’是完全正确的。”张春桥敢于在北京的会上公开支持砸“联司”的行动，说明他是摸到了毛泽东的底，他知道毛是支持这次行动的，所以才敢于出来说话。

北京和外地的一些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已处于失意的在野状态，所以他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同情“联司”，这是从全国范围的角度来观察的。至于在上海，“联司”和“工总司”的矛盾，更是在野的造反派和掌权的造反派的矛盾激化的表现，在支持“联司”的队伍里，我曾经发现过戴祖强的弟弟，是“支联站”的头头，而戴祖强是“工总司”一兵团的负责人，在上海“一月夺权”的时候，他曾要成立一个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和二兵团的耿金章相结合，另外成立一个政权，后来被王洪文砸掉了。戴祖强的弟弟就说他的哥哥是被压制的，所以他要支持“联司”。其他像“红革会”的某些人、“炮司”的某些人也支持“联司”，因为他们在“一月夺权”中都是受压制的，这正反映了当时的权力争夺。

但我并不认为当时代表“联司”观点的人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他们同样拥护文化大革命，他们也打着“批判修正主义”、“打倒走资派”的旗号，也主张推翻上海市委，也高呼“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口号，只是因为他们在本单位、本地区的掌权问题上受到压制，所以才四出串连，和社会上各种各样被打下去的力量结合起来，想用各种方法掌权，于是就出现了大动荡和大武斗。夺权和反夺权，夺取权力后如何瓜分权力，这是上柴“联司”问题所以爆发的深层的社会原因。

毛泽东讲过文革一年发动，两年搞彻底，三年收尾。但搞到那时，反而天下大乱，违背了他的初衷，所以他想要稳住大局，决不允许再天下大乱。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他在视察全国时，也说过七、八、九月以后，全国的形势要稳定的话。上柴“联司”和各地一些在野的、没有得到权力的组织提出“上海要第二次大乱”、“全国要第二次大乱”，肯定不符合毛当时的战略部署。所以我觉得，如果把砸“联司”与武汉事件、与毛泽东视察全国、希望稳定的设想联系起来，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些事件的发生背景和发展脉络了。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第十三章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